2017 年第 6 期
（第 16 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下的农场规模选择

管 珊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通过对湖北省和山东省 104 个农场的问卷调查，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了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的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下的规模选择问题。在加入社会网络自变量和年龄、农场类型两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农场规模选择的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支持网络、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的选择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策支持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显著，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均部分显著。在国家、市场和村社这三重网络结构嵌入中，农场主与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此，为推进规模经营和农场发展，应改善与农场发展相关的结构位置资源，加强农场主多维网络平台建设，培育村社本土农场发展。

关键词： 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农场规模；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 F3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7)06－0011－09

一、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选择

中国农业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农业经营规模过小。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数量达到 2.6 亿，平均每户就有一个非农劳动力，农业兼业化越来越明显[1]。国家财政高度补贴兼业农，导致小规模经营长期滞留，影响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形成“国货入库，洋货入市”的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格局[2]。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化解中国农业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目前阶段而言，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困难不是规模太大而出现的效率损失，而是体现在如何改变分散小规模经营的现状，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因此，对于拥有不同经营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规模选择的差异呢？最近几年随着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的推行，从事规模经营的农场发展迅速。农场规模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农场规模问题主要是土地经营规模问题。

适度规模经营旨在根本改变分散小农户的经营现状，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实现规模效益。技术视角下的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是为了求取最佳技术效率，而经济视角下的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是为求取最佳经济效益或最大经济效率。部分学者从技术角度讨论土地经营规模问题，如王启善[3]认为土地规模经营要有相应的技术服务如机械化作支撑，李忠国[4]指出在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农场主的经营规模都随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但更多学者是从经济视角解读土地规模经营问题。林善浪[5]认为推进农地规模经营要以劳动力的转移、耕地流转市场化和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为前提。规模经济的获得可从内外部两个方面来看，内部规模经济有扩大土地面积、零散土地整改、生产要素投入同比例扩大等；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公共设施、市场积聚、产业关联等因素带来的[6]。克服农地小规模经营弊端，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获取

收稿日期： 2017－07－11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7.06.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SH006）

作者简介： 管 珊（1987—），女，湖北石首人，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与农村社会治理。E－mail：gshanluck@126.com

规模经济效益构成了我国实行农地规模经营的逻辑起点[7]。农民是理性经济人,当土地流转的预期收益高于成本时,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力增强[8];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即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其规模水平就被决定了[9]。

然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或者农场规模的选择并不是只由技术或者经济条件决定的。许多地区规模经营发展的实践表明,同一地区同一经济条件下的农场之间规模选择存在明显的差异。区别于既有文献从技术视角和经济视角对农场规模大小的解读,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研究农场规模选择与农场主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相关问题。

二、社会关系网络与家庭农场规模决策

波兰尼[10]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指出经济活动往往靠非经济机制维系,因此市场的发展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经济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是附属于社会的。Granovetter M[11]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指出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个体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经济生活始终嵌入在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网络为经济行为提供信任和资源,实际上也构成了个体的一大资本类型——社会资本。Lin N[12]运用嵌入性理论思想,指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被获取的资源。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会促进或者约束行动者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因此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构成了个体行为的结构约束或者机会。社会网络代表着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个体行为(包括经济活动)嵌入在多重网络结构之中,受结构制约,但同时也产生有利于行为的资源以帮助行动者实现行动目标。

根据嵌入性理论的逻辑,国家、市场与村社是家庭农场发展的位置资源①,国家、市场与村社处在不同的结构位置,嵌入在位置中的资源不会因占据者的改变而改变。结构位置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构建有关,因为位置资源常常在个人与个人的互动中被带入。因此,农场主社会关系网络即是对国家、市场与村社位置资源的结构性嵌入。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位置资源是一定的,但因为农场主关系网络不同,农场嵌入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的程度也不同,因而农场主从国家、市场与村社获得的支持度各有差异。农场主在国家、市场与村社三方面获得的支持都将影响农场资源获取行为,进而对农场规模选择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中的嵌入程度越高意味着农场获取内外部资源的难度越小,因此农场越倾向于从事更大规模的经营。不少学者已经论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结构、市场结构和村社结构的位置资源对农场发展特别是农场资源获取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国家政策结构位置资源及其对农场发展的影响

嵌入在国家政策结构位置中的资源主要包括项目资源和贷款资金。农场在经营初期一次性投入集中,资金需求较大,在农田基础设施改造和固定资产投入等方面既需要政府在政策或项目上给予支持,也需要金融贷款支持。资本要素扩张是农场成长的关键[13]。政府给予农场相关农业项目,既能引导农场发展方向,又能弥补农场资金短缺的局面[14]。其次,农场开展规模经营需要投入小农户远不可企及的资金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且农业经营遭遇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其他行业更高[15],因此金融政策在农场发展中也尤为重要。

---

① 位置资源主要是指嵌入在宏观结构中的资源,资源依附在位置上,不因占据者的改变而改变,资源的存在保障了结构的稳定。结构存在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因此有些资源是呈纵向等级状态分布的,而有些资源是呈横向水平状态分布的。位置资源的获得除了占据位置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社会网络。不同的位置资源都将在个人与个人的交往网络中带入。关于位置资源的更多讨论详见文献[12]。

(二)市场结构位置资源及其对农场发展的影响

区别于农户小规模经营,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场经济是完全面向市场的经营行为。农场是一体化组织,在采购、生产、加工等方面呈现一体化态势,因此农场主拥有采购活动网络、技术交流网络和营销网络等多重网络[16]。它们为农场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和资源,使农场的经营活动在瞬息万变和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持续下去。农场发展促进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集聚,加强了与产供销主体间的互动。农场与外部供销主体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资料成本,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而农场与农场之间的同行合作则是为了提高农场主与外部供销主体间的谈判能力。与此同时,农场发展需要技术服务支撑,然而基层农技推广服务并不能满足农场需求[17],因此与高校等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对农场而言也尤为重要。

(三)村社结构位置资源及其对农场发展的影响

农场发展需要村社支持。农场规模经营以土地为载体,而土地来自于村社中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因此,普通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是农场发展不可回避的村社互动主体。农场主与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网络成为制约农场获取村社结构位置资源的主要因素。对与外来者经营的农场相比,本土农场在基于地缘和血缘的村社内部关系网络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并能够解决在流转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中的信息不对称,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舒尔茨[18]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也提出鼓励在地化农场发展的建议,与居住在非本地的农场主相比,居住在本地的农场主具有更加稳定的合约形式。经营者的本地人特征意味着经营者具有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从而与本地村民之间产生信任与社区认同感,正向影响规模经营的开展[19]。

由此可见,国家、市场与村社是农场发展面对的主要结构性力量。这些结构性力量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农场主与上述各相关主体间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现阶段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中呈现怎样的嵌入状态呢?实践中农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场资源获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哪种影响又最为重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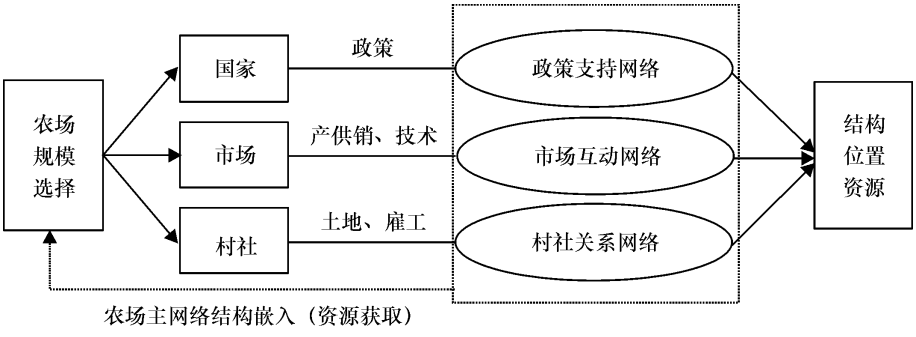


图 1　农场规模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家庭农场实地问卷调查搜集的数据。该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农场基本情况、经营管理、关系网络与发展预期等方面。本研究所用问卷数据来自于湖北省鄂州市(35 份)、湖北省十堰市(40 份)以及山东省宁津县(36 份)三个地区的调查。鄂州市的调研工作于 2015 年 6 月份进行,十堰市的调研工作于 2015 年 9 月进行,宁津县的调研工作于 2015 年 8 月进行。在根据所调查地区家庭农场名单随机抽样后,调查员对所抽取农场的农场主进行问卷调查。为保障问卷质量,每个问题都由调查员向农场主陈述清楚(将众多书面用语转化成口头用语)后,再根据农

场主的回答表述作出相应选择。调查共搜集111份问卷,剔除7份填答不全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04份。

受访农场主以男性为主,占比92.8%;年龄主要分布在41~50岁。多数农场主为农场所在地村民,占比72.1%。农场主文化程度分布如下:小学文化程度占比2.7%,初中文化程度占比41.4%,高中文化程度占比41.4%,大专及以上占比14.4%。农场经营平均年限为5.9年。经营农场年限3年以下的占比47.7%,4~10年的占比38.3%,11~20年的占比8.4%,21年以上的占比5.6%。

(二)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探讨农场主多维网络结构嵌入与农场规模选择的关系,因此,农场规模选择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场规模选择在本文中区分为规模由小到大的5种类型:50亩以下、50~100亩、100~300亩、300~1000亩和1000亩以上。因此农场规模选择是多分类且有序的变量。若研究不同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对有序多分类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效应,可采用多项有序回归分析方法。在各类别的概率分布大致均匀的情况下,一般采用Logit连接函数。设被解释变量有k个分类,建立$k-1$个广义发生比模型:

$$\text{Logit}_{k-1} = \ln\left(\frac{\pi_1 + \pi_2 + \cdots + \pi_{k-1}}{1 - \pi_1 - \pi_2 - \cdots - \pi_{k-1}}\right) = \beta_0^{k-1} + \sum_{i=1}^{p}\beta\chi_i \quad (1)$$

式(1)中,π_1,π_2,…,π_k分别表示各分类的概率,β_0表示截距。式(1)表示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解释变量χ_i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该分类概率的Logit值增加(或减少)β_i个单位。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场规模选择

通过对农场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农场规模集中分布在300亩以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72.1%。在各经营面积类别中,土地面积在100~300亩的农场占比最大,为34.6%;其次为50亩以下,占比24%;再次为300~1000亩,占比22.1%;最后是50~100亩和1000亩以上的农场,分别占比13.5%和5.8%。

2.解释变量:关系网络

问卷共设计了21个变量(评分项目)测量农场主的关系网络,农场主根据实际情况给出测量分值。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这21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需要首先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从中提取出几个能够反映某些变量共同特性的几个较少的公共因子。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对原有反映关系网络的21个变量是否相关做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33,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554.436,自由度为210,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原有21个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1所示。

因子主成分分析中,按照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提取变量,使得因子个数小于原有变量。为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改变各因子的方差贡献,最后得到5个公因子,分别被命名为政策支持网、供销互动网、村民关系网、技术互动网和村干部支持网。政策支持网是农场主与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关系网络,供销互动网是农场主与供销及同行主体间的关系网络,村民关系网是农场主与流转地村民间的关系网络,技术互动网是农场主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关系网络,村干部关系网是农场主与流转地村干部间的关系网络。5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0.207%,表明5个公因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原来的21个变量并用来解释关系网络的主要内容。

表 1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

评分项目	成份				
	1	2	3	4	5
E1 与政府有关系	0.822	0.233	0.116	0.124	0.118
E2 能获政府支持	0.794	0.200	0.207	0.133	0.116
E3 与工商部门有关系	0.772	0.064	0.195	0.103	-0.038
E4 工商部门帮忙解决麻烦	0.718	0.087	-0.099	0.237	0.212
E5 与金融机构有关系	0.715	0.193	-0.091	0.102	0.205
E6 能获金融支持	0.568	0.052	0.379	0.222	0.037
E7 与供应商有关系	0.000	0.876	0.101	0.167	0.165
E8 能获供应商支持	-0.019	0.813	0.145	0.186	0.209
E9 与收购商有关系	0.409	0.740	0.026	-0.130	-0.147
E10 能获收购商支持	0.371	0.693	0.076	-0.009	-0.140
E11 与同行维系很好关系	0.422	0.567	0.054	0.000	-0.237
E12 能获同行支持	0.525	0.542	0.147	-0.002	-0.233
E13 在村民中有良好声誉	0.174	0.042	0.876	0.035	0.074
E14 土地流转更容易	0.109	0.094	0.866	0.027	0.061
E15 雇工更容易	-0.013	0.042	0.712	-0.094	0.292
E16 与雇工关系良好	0.115	0.058	0.663	-0.014	0.415
E17 雇工能尽职工作	0.036	0.394	0.594	0.120	0.074
E18 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关系良好	0.247	0.097	0.030	0.919	0.006
E19 能获高校或科研机构技术支持	0.293	0.084	0.008	0.916	-0.029
E20 与村干部维系很好的关系	0.139	0.003	0.336	-0.025	0.757
E21 能获村干部支持	0.240	-0.063	0.350	0.018	0.734
新因子命名因子	政策支持网	供销互动网	村民关系网	技术互动网	村干部关系网
特征值	4.292	3.408	3.372	1.949	1.723
方差贡献率/%	20.437	16.227	16.058	9.279	8.206
方差累计贡献率/%	20.437	36.664	52.722	62.001	70.207

上述 5 个公因子的提取表示社会关系网络被划分成了 5 个维度,其划分是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划分与研究目的有关。本文主要考察农场主在国家结构、市场结构和村社结构的网络嵌入状况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因此,以农场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农场在国家政策、市场、村社的结构性嵌入状况。其中,政策支持网代表了农场在国家政策结构中的网络嵌入状况;供销互动网和技术互动网代表了农场在市场结构中的网络嵌入状况;村民关系网和村干部关系网代表了农场在村社结构中的网络嵌入状况。

在提取公因子的同时,以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分别计算各因子得分。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社会关系网络综合得分。关系网络各因子以及综合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

结果显示,农场主关系网络综合得分是 1.976,表明农场所获关系网络支持度很低。对于构成关系网络的 5 个公因子,村民关系网给予农场的支持度最高,达到 3.727,介于“一般”和“比较符合”之间;供销互动网次之(3.560),也在符合之列;政策支持网、技术互动网和村干部关系网均在“一般”和“不太符合”之间,表明农场所获政政策支持、技术支持或村干部支持度均较低。换而言之,现阶段农场主在国家政策结构中的嵌入性状况并不理想,在市场结构中的嵌入性状况部分良好,在村社结构中的嵌入性状况也部分良好。

表2 农场主关系网络各因子以及综合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关系网络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政策支持网	104	2.011	1.321
供销互动网	104	3.560	1.211
村民互动网	104	3.727	1.251
技术关系网	104	2.013	1.426
村干部关系网	104	2.460	1.055
关系网络综合得分	104	1.976	0.414

3. 控制变量

农场主年龄和农场类型是可能影响农场规模的因素。已有研究显示,农户风险态度受户主年龄影响[20],而农场经营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因此农场主年龄可能会对农场规模产生影响。农场类型不同,农场发展对土地的依赖不同,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也会呈现差异,因此农场类型也是影响农场规模选择的因素。

因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是农场主年龄和农场类型。根据对农场主年龄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农场主年龄的分布如下:30岁及以下有9家,占比8.1%;31岁到40岁有31家,占比29.8%;41岁到50岁有46家,占比44.2%;51岁以上有18家,占比17.3%。问卷设计中农场被分为3种类型:种植型,养殖型和种养结合型。调查结果显示,种植型农场有41家,占比39.4%;养殖型农场有29家,占比27.9%;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有34家,占比32.7%。

四、社会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

农场主关系网络综合得分与农场土地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38,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农场主关系网络与农场土地规模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既然农场主关系网络与农场土地规模之间显著相关,那么代表农场主网络结构嵌入性的关系网络各因子对农场土地规模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将构成关系网络的5个主要因子设为自变量,将农场主年龄、农场类型设为控制变量,建立关于农场土地规模选择的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其结果如表3所示。零模型的-2倍的对数似然比为307.449,当前模型为249.943,似然比卡方值(-2倍的对数似然值减少)为57.505,概率P值为0.00。如果显著性水平α为0.05,则应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零假设,说明解释变量全体与连接函数Logit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选择正确。平行线检验也显示显著性为0.00,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表3 农场规模选择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

	项目	估计	标准误	Wald	Df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阈值	农场规模=50亩以下	2.42	1.269	3.636	1	0.057	-0.067	4.908
	农场规模=50~100亩	3.547	1.285	7.619	1	0.006	1.028	6.066
	农场规模=100~300亩	5.702	1.367	17.401	1	0	3.023	8.382
	农场规模=300~1000亩	7.764	1.464	28.131	1	0	4.895	10.633
位置	政策关系网	0.291	0.147	3.912	1	0.048	0.003	0.579
	供销关系网	0.114	0.155	0.545	1	0.46	-0.189	0.417
	技术支持网	0.282	0.136	4.341	1	0.037	0.017	0.548
	村民关系网	0.383	0.172	4.922	1	0.027	0.045	0.721
	村干部支持网	0.265	0.193	1.879	1	0.17	-0.114	0.644

家庭农场类型 = 种植型	0.76	0.456	2.769	1	0.096	−0.135	1.654
家庭农场类型 = 养殖型	−1.912	0.553	11.971	1	0.001	−2.995	−0.829
家庭农场类型 = 种养结合型	0①			0			
年龄 = 30 岁及以下	0.293	0.795	0.135	1	0.713	−1.266	1.852
年龄 = 31 ~ 40 岁	1.277	0.603	4.476	1	0.034	0.094	2.46
年龄 = 41 ~ 50 岁	0.679	0.56	1.471	1	0.225	−0.418	1.776
年龄 = 51 岁以上	0②			0			

注:①②因为该参数是冗余的,所以将其置为零。

社会关系网络各因子中,政策支持网、村民关系网、技术互动网是影响农场规模选择的显著因素,而供销互动网和村干部关系网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农场在国家政策结构的网络嵌入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完全显著,农场在市场结构和村社结构的网络嵌入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均部分显著。此外,农场主年龄和农场类型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农场主年龄在 51 岁以上与农场主年龄在 31 ~ 50 岁相比农场规模有差异,种养结合型农场与其他类别农场相比农场规模均有差异。由表 3 可知,各个位置值(被解释变量)对阈值(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一)农场主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

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中的网络嵌入即农场主政策支持网络、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均对农场规模选择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农场主政策支持网、技术互动网和村民关系网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中的网络嵌入对农场规模选择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在:政策支持网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的 Logit 值就增加 0.291 倍,即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平均增加 57.2%;技术互动网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的 Logit 值就增加 0.282 倍,即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平均增加 57.0%;村民关系网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的 Logit 值就增加 0.383 倍,即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平均增加 59.5%。由此可见,村民关系网因子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程度最高,政策支持网次之,技术互动网最后。

村民关系网因子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程度最高,表明农场在村社结构中的网络嵌入状况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最为重要。可能的解释是农场规模选择的不同主要体现了农场主获取土地资源能力的不同,而土地获得建立在与村民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流转的基础上。在绝大多数土地掌握在村民手中及农户土地承包权利进一步确权的背景下,农场主土地获得主要来自于村民,因此村民支持对农场规模选择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在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中,村社关系网络最为重要,因为在中国农村关系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具备村社关系网络的农场主基于地缘性和血缘性关系,能获得更多的村社支持,进而调动村社资源,为农场获取土地、劳动力资源提供条件。

(二)农场主年龄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

农场主年龄对农场规模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以农场主年龄在 51 岁及以上的组为参照,农场主年龄在 31 ~40 岁的组对农场规模选择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在关系网络、农场类型相同的条件下,农场主年龄在 31 ~40 岁组的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的 Logit 值比农场主年龄在 51 岁及以上组高出 1.277 倍,即 31 ~40 岁的农场主选择更大规模的可能性比 51 岁及以上农场主高出 78.2%。说明中青年农场主(31 ~40 岁)在选择规模等级更高的倾向性上高于老年(51 岁及以上)农场主。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如兰勇等[21]的研究表明现阶段农场主多为中青年农民;中青年农民具有将农业作为长期事业发展的信念,更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因此选择更大规模经营的可能性较高[22]。

(三)农场类型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

农场类型各组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均显著。但是不同类型的农场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农场类型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农场主年龄、关系网络相同的情况下,种植型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的 Logit 值比种养结合型农场高出 0.760 倍,即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平均高出 68.1%;养殖型农场选择更大规模可能性的 Logit 值比种养结合型农场低出 1.912 倍,即农场规模选择可能性平均低出 87.1%。说明种植型农场对土地规模的需求要显著高于养殖型农场,而种养结合型农场对土地规模的依赖介于种植型农场和养殖型农场之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养殖型农场对农场规模等级影响的估计系数(1.912)很高,说明相较于种养结合型农场,养殖型农场对土地规模的依赖度很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对山东、湖北两省三地 104 家农场的问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的多重网络结构嵌入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得出 3 个主要结论:第一,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的网络嵌入状况并不是很理想,农场所获社会关系网络综合支持度较低。比较而言,农场目前获得了较好的村民关系网络支持和供销互动网的支持,但是农场在国家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村干部支持上获益较少,农场在市场与村社结构中的嵌入性状况要好于在国家政策结构中的嵌入性状况。第二,农场在国家、市场和村社结构中的网络嵌入性即农场主政策支持网络、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的选择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国家政策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显著,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均部分显著。第三,在国家、市场与村社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中,农场主村社网络嵌入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最为重要。农场规模等级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村民关系网络的支持,说明农场主与村民的关系网络资源对农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促进农场获取资源开展规模经营,进而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从事规模经营的农场而言,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不仅只受经济条件的约束,农场主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中的网络嵌入也对规模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给出以下建议:第一,从宏观上改善农场发展的结构位置资源,加强国家政策与农场的对接,改善农场主获取国家政策支持的能力。建立政策与农场主之间的服务对接平台,优化政策供给的途径,提升政策服务于农场发展的水平。第二,要注重农场主多维关系网络建设,加强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结构中的嵌入性。利用各种平台促进城乡资源整合和网络互动,提升农场主网络资源丰富性,为农场发展获取资源奠定基础。第三,注重培育村社本土农场的发展。本土农场主相对于外来农场主具有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先赋性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农场在获取村社内部土地、劳动力资源时的交易费用,因此村社本土农场主能够充分调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降低农业经济转型成本,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红宇.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N]. 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1-14(7).

[2]何秀荣. 关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2016(9):4-15.

[3]王启善,王志刚. 试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及模式[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1998(1):87-90.

[4]李忠国.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形式若干问题的思考[J]. 农村经营管理,2005(11):20-21.

[5]林善浪. 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和行为特征——基于福建省和江西省 224 个农户问卷调查的分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5-20.

[6]蔡昉,李周. 我国农业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利用[J]. 当代经济科学,1990(2):25 - 34.
[7]黄季焜,马恒运. 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与主要国际竞争者的比较[J]. 中国农村经济,2000(5):17 - 21.
[8]王力. 中国农地规模经营问题研究[D].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30 - 50.
[9]陈欣欣,史清华,蒋伟峰. 不同经营规模农地效益的比较及其演变趋势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0(12):6 - 9.
[10]波兰尼.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 - 2.
[11]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3):481 - 510.
[12]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ac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 17.
[13]汪上,刘慧娟,李宝礼. 要素聚合:家庭农场成长路径[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3):31 - 36.
[14]董亚珍,鲍海军. 家庭农场将成为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式[J]. 社会科学战线,2009(10):95 - 98.
[15]高帆,张文景. 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J]. 探索与争鸣,2013(6):57 - 61.
[16]孙捷,张保林. 家庭农场关系网络运作过程与机制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104(2):80 - 86.
[17]魏琪嘉. 稳步发展家庭农场,推进农业经营组织化建设[J]. 理论参考,2013(6):53 - 54.
[18]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5 - 111.
[19]钟真,谭玥琳,穆娜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研究——基于京郊农村的调查[J]. 中国软科学,2014(8):38 - 48.
[20]胡宜挺,蒲佐毅. 新疆种植业农户风险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 - 6.
[21]兰勇,谢先雄,易朝辉,等. 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2 - 97.
[22]朱启臻. 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7 - 159.

Scale Selection of Farms in the Embedded Multi-network Structure

GUAN Shan
(*Economics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04 farms in Hube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this paper studies farm scale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 ordin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social network and the two control variables of age and farm ty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support network, the market interaction network and the villag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cale choice of farm. Among them, the policy support network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cale choice of farm, and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interaction network and villag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on farm scale selection are partly significant. Among the three network structure embedded, country, market and village community, the farmer' villag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farm scale selec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farm development, we should improve the structure location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 platform, and cultivate local farms.

Key Words: scale management; farm; scale of farm; social network